

·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学术主持人:乔瑞金)·

编者按:在英美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中,国家和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他们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对社会主义的深度思考,无不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这一主题的多维度的理解和探索,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学术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栏目刊发的这四篇文章,主题都是与国家治理相关的问题,其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探析》和《英国结构主义学派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范式研究》两篇文章,从总体上分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批判,探讨了具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特征和意义;《国家治理“都市总问题式”的实践路径》一文,就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思想做了批判性分析和意义阐释;《鲍勃·杰索普的元治理理论探析》一文则分析了当代颇有影响的杰索普的国家元治理理论。总体来看,这几篇文章大致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有丰富的内涵和一定的代表性,对于目前和今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社会变革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探析

乔瑞金 任新元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新左派运动中滋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理念,强调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的文化,主张在弘扬传统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思想替代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进程,形成了具有“英国特性”的文化价值选择和“英国风格”的总体性历史意识的文化理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开展具有“英国品质”的文化实践,以此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觉悟,指导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促进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主张为人民赢得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从而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推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1-0058-10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2.01.008

面对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混乱的社会秩序、走向极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极权化统治和新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一场被称为新左派的社会运动在英国骤然间暴发。在追求社会主义在世界的整

收稿日期:2021-11-17

作者简介:乔瑞金(1957—),山西石楼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新元(1991—),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HQ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体成功的浪潮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理念,强调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的文化。<sup>①</sup>主张在弘扬传统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思想替代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觉悟,形成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指导现实的文化实践,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促进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为人民赢得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推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围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基于文化发展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思想和情怀,分析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参考。

### 一、“英国特性”的文化价值选择

通常认为,威廉斯、霍加特与汤普森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围绕文化创作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如威廉斯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5)、霍加特出版的《识字的用途》(1957)以及汤普森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著作,被认为是开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理解、解释和创新英国文化的先河。其核心理念是文化唯物主义,即一种历史文化唯物主义的形式。<sup>②</sup>主张在现实的时空条件下把握文化的特性和生长规律,在其生产和接受的物质条件背景中看待文化的意义,在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发挥文化的生活和斗争的功能,在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中体现文化的权力和价值,从而在英国逐渐形成一种影响巨大的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念。其赋予文化唤醒大众的反抗意识、凝聚革命力量争夺领导权、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形成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重要作用,甚至使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表征形式和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主导话语。文化唯物主义也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主张和主流意识。

文化唯物主义在对各种文化意识的批判性分析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主张,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是那么轻松和茫然的,而是在一系列批判性的历史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起点上具有彻底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理论的品质,认为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意志,体现为文化霸权和文化统治。然而,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不加区分地断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因为大量的文化是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文化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或者语言的某种特定用法,而是一种基本的集体观念和由此产生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资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从本性上讲,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文化包含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们不仅持续不断地互相作用,而且也存在两者并存的交集领域,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总体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具有社会性的特征,是工业革命以来一个非凡的创造性成果,是那些“粗鄙的群众”付出了很大努力才形成的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的文化成就,它不仅记录了工人阶级积极主动、旗帜鲜明地对抗资产阶级的社会行为,而且记录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追求。<sup>③</sup>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意识乃至文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从根本上阻碍了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样的文化必须被推倒,工人阶级的文化必须大力弘扬。

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坚决反对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和决定论的文化意识,它把苏联主张的文化理论逐一地同英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相比照,戏称这一工作是“同天使较量”,较量的结果就是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的文化。但这种文化阐释和预测的基础不是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文化原则,而是源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

①[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290页。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③[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9页。

义思想的文化理念。在这一点上,威廉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开创者,尽管他的文化思想中所提出的预想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在新左派运动中结合了当时人们关于文化的大量研究和许多重要观点,吸收了人们在教育、文学讨论、电影协会、出版与报业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方面的创造成果的产物。

对于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人来说,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创造文化,必然要同英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空洞无物,就不能解决英国的问题。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具有特定历史结构、特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定位的存在,它反映了持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的“真相”,体现着他们的诸多需求、愿望、行为和抱负,文化就是对这些需求、愿望、行为和抱负作出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是“种族历史特征”的表征形式,体现着种族或国家的政治、族群、阶级、性别和家庭,以及征服和统治、拥护和排斥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因此,文化是一种“种族历史特征”的符号,它使得那种对权力的原始行使和权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完全空泛的理解失去了意义。<sup>①</sup>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一直以来,人们围绕“英国特性”所做的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却是混乱和空泛的,因为缺乏阶级意识和正确的理论支撑,因此对于英国自身的“特别处境”没有准确的把握,只是流于各种琐碎的、礼仪性的繁文缛节,既没有体现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特征,也没有体现出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价值论意义。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战后进行了种种文化辩论,试图对至少从17世纪就开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特性作出反应,对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比较激进的民主化的主张。尤其在新左派兴起以后,以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围绕着政治、“权力”以及统治等概念展开,其文化意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尤其是在文化唯物主义的年青一代的学者那里,甚至把文化研究转向了文化政治学和文化伦理学的场域,使得对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认识与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而在这一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选择了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研究原则,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了,由此对各种文化现象展开了深刻细致、条理清晰的系统分析和阐述,展现了具有“英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目的性。

“英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着重于阐释英国在认识事物、体制、惯例和观念方面的一般特征,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极权化统治的本性,批判英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拒绝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后果以及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特点,在强调文化是整体的生存方式的核心理念的同时,也强调了文化是一种斗争方式的思想。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特别反对文化研究中的抽象性的思维方式。<sup>②</sup>他们反对把文化概念抽象化和对待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尤其反对那种“为文化而文化”“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意识。主张将“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境况,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烈主张文化形式和思想结构、观念结构与它们的内容的统一,排斥外在论和机械论,从而强调了文化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正如威廉斯所做的那样,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系统,表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念,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观念表现,因此,“文化理论”就是“对一个整体生活方式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作为被定义了的反映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可以区分为三个紧密联系的层次,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们生活文化、被记录的文化和有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人们生活文化,是只有那些在这个时间和地点生活的人能够进入和拥有的文化;被记录的文化是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体现为从艺术到最日常生活的事实;有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则是人们的生活文化和历史文化的

<sup>①</sup>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Arts: Theoretical Legacie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286.

<sup>②</sup>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in J. Storey (ed.), London: Arnold, 1966, p.39.

连接因素,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实践的连续性和阶段性。<sup>①</sup>

在威廉斯对文化所做的这一定义及其层次分析中,特别突出地表达了文化作为实存的五个特点,也就是文化的“唯物性”的总体特征,从而系统地阐发了具有英国特性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其一,文化具有历史性和空间性,因此,并不存在亘古不变和普世性的文化,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运用,也是对自由主义宣称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唯一性的深刻批判;其二,文化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背景下的存在状况,文化就存在于人们实际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条件中,因此,离开时代性和物质性谈论文化只能是唯心主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观点;其三,文化是人们生活的记录,因而,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普通的,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实践的 and 生产的,不存在静止不变的文化,体现出文化的发展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体现出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与所表现出的文化形式之间的深层关系;其四,文化体现为人们共同生活的特点,是人们共享的,是文化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因此,无论文化生产的形态、运动形式和文化观念多么复杂,它都是共同体的标识和记号,包括了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产生和表达的实践意义、审美目的和不同式样;其五,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和发展,体现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的特征,体现着人们文化实践的选择性传统、文化再生产的意义和一个“已实现的标志系统”的“选择性”的社会组织即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式样与他者的管理体系和价值理念的差别。威廉斯对文化意义的深刻揭示,其目的是重组一种文化的“感知结构”,体现出文化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把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彰显出独特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特性和思想意识,由此,把他们的文化主张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代表了在思想方式上对自身优秀传统的延续和张扬,现实与过去的密切结合,把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概念具体化,分析各种不同的观点与文化现象的关联性,把甄别与创新放到历史的场域中由经验和实践来加以判断。不难看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现实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体现“英国特性”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导向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对于文化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意义。

## 二、“英国风格”的总体性历史意识

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在破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它赋予文化的重要使命。这样一种赋予,是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过程中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本质意蕴的基础上作出的,体现出具有英国风格的文化的能动性和总体性的历史意识的思想。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模式,尤其在对文化作为社会的构成要素方面,主张文化存在的相对独立性、文化与经济基础和道德法律的相互作用性以及文化的能动性。当然,这样一种断定以承认和肯定经济基础对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首要性作用为前提。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们今天所理解和感受的文化,与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文化观念及“文化观念”作为一个概念的现代用法,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尤其是自18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内涵逐渐演变,可以认为是人们在面对英国社会变革时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扩展性的表现,是人们整体生活在不同时代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文化传统的存在,有时候甚至会受到传统的决定性的影响。显然,文化既是传统的延续,也是传统的一种不断的扩张,在延续和扩张中保持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sup>①</sup>[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66页。

<sup>②</sup>[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页。

了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来证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包括对文化概念的缘起和本质意义的阐释,文化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差异性,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与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价值选择的物质基础性与特定时期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性,人们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一般礼仪、语言运用规则、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等问题,尤其是深入开掘战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理念的独特性与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的现实性,从而说明文化既受到以技术进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和能力的根本性制约,受到特定时期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但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按照霍尔的说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转移,也可以认为是文化研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移。<sup>①</sup>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把握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既不是试图仅仅在逻辑上回答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为了批判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关于文化本性的错误认识,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把握作为一般文化的普通性和工人阶级文化的时代意义,努力把握当代工人阶级生活的特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意识的现实状况,以及探寻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方式方法等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看来,面对当代社会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化和文化的扩张性现实,工人阶级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必须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提升文化创造能力,以抵御现实的社会发展对工人阶级队伍的侵蚀和威胁,始终同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保持一致,克服对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依赖,在工人阶级“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用新的方式重塑自己的身份。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思考中发现现实社会存在状况的内在结构,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重新理解和定义社会斗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指导革命斗争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只把文化看作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般反映,同时也是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仅仅把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的批判,从而使“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現”。

上升到人类学的意义上看待文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注入文化理念之中。由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对文化的正确的理解也必然得出人民创造文化的结论,从而在文化领域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批评了文化创造上的英雄论和精英论,在文化研究领域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方法论原则,突出人民大众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那里,“自下而上”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理解和解释文化的基本方法,也是一种原则立场,起着引领精神发展和思维创新的根本作用。

威廉斯的文化创造的人民大众思想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一点是人们公认的。对于霍加特来说,他在《识字的用途》中同样以强烈的感情,描述和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对“商业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正如《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作者巴克所说“霍加特的遗产是给予了对工人阶级文化,即对普通人寻求过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和实践的详细研究以合法性。”<sup>②</sup>汤普森在创立独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中心主题就是“下层历史”,是“从下往上看历史”的坚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涉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信仰、态度和实践等丰富的内容,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文化是生活的和普通的思想。不仅把阶级看成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强调了阶级是社会关系和经验的组合。工人阶级的文化就是工人阶级共享的共同经验和感觉,表达对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认同。汤普森强调英国工人阶级在他们自身形成的过程中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作用,寻求确保工人阶级在历史认识上的经验<sup>③</sup>,从而在阶

<sup>①</sup>转引自[澳]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sup>②</sup>[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sup>③</sup>[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级文化的条件下,理解普通人和工人阶级的人民斗争,为共产主义编年史学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念。不难看出,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研究上的“从下往上看历史”的方法,虽然有着观点和论证上的差异,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在英国开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sup>①</sup>,突出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先锋作用,同时也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展了建设性的辩论和对话。

确立文化存在的真实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能动性,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新左派运动中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之间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由此而形成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时性的发展和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持续性的积极影响。正如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核心人物霍尔在1990年所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文化研究,通过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批判,通过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条主义的模式得以开始和发展。在英国,无论是精微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粗俗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模式探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于与错误意识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又是必要的、长期的和无止境的。<sup>②</sup>如前所述,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甚至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与“天使的较量”中逐步产生出来的。对话的对象既包括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了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英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思想,最终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即所谓“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英国品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历史意识。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之间之所以能够顺畅地接合,是因为二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亲和力,是在目的论或者说在黑格尔的综合论的思想上达成了一致。<sup>③</sup>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解、解释和创造文化的根本性的指导原则,这就把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和价值意义的判断提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提升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和秩序建构的层面。于是,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众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状况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诸如女性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研究等,都以多种方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文化革命、生活方式变革、破除霸权等术语。权力和领导权问题逐步走向文化研究的中心,文化研究也逐步发生了文化政治学的转向,在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要性的同时,寻求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对于这一状况,霍加特声言文化研究注入了“红细胞”,霍尔则说文化研究真的在某一个“创建”时刻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权力意识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从一开始关注文化的普通性到文化研究聚焦工人阶级文化再到社会主义的文化权力意识和社会领导权,展示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和以争夺领导权为轴心的权力关系。

工人阶级文化能动性在社会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与工人阶级文化意识的提升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深知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大众文化的研究被提到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上来。

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和以霍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发展大众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他们不仅呼吁要为广大文化留出空间,而且发展出一套推进大众文化繁荣的政治和艺术策略,以此来争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认可。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对所谓“高雅艺术”采取一种

<sup>①</sup>[英]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79.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sup>③</sup>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80.

敌对的态度,反对任何文化形式的结构等级观念,将整体文化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和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对待。在他们看来,所谓高雅文化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也不是体现人的等级存在的文化,这如同大众文化也并不只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一样,只是人们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而导致的艺术欣赏的习惯与方式不同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工人阶级更习惯欣赏大众文化。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更加重视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更加重视大众文化中的阶级意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大众文化创作和生产中作用的加强,大众文化中“社会民主”政治意识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越来越显著的重视和表现,倡导以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抽象的等级关系去表现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以“小人物”为表现中心,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强调一体上的社会多样性,以“抽样”的方式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争取社会民主的斗争,做出了被霍尔称作完全是“英国风格”的大众文化成就。

### 三、“英国品质”的文化实践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对霸权、聚焦文化权力的理论形式和文化实践,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的理论观点更体现出上述特征。从霍尔开始,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实践中争夺文化领导权乃至推进社会权力彻底改变的政治意识,他们不仅基于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权力概念的存在论基础,而且把权力看作是国家的本质,是决定工人阶级能否得到解放的关键性因素。文化马克思主义倡导文化的普通性和共享性,在突出和采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概念和观点的同时,推进对文化本质、文化生产和实践以及文化创新的科学认识,把工人阶级文化的阶级意识和文化的科学主义意识有机统一起来,打造出具有“英国品质”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思想,助推科学社会主义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的整体实现。

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争夺文化权力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有时候甚至几乎把它看成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唯一目标。<sup>①</sup>在他们看来,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精神表现的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创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能力,这一点通过实证的研究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由于人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人们创造文化意义的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争取个人的文化权力乃至群体、共同体的文化权力方面也会很不相同,甚至文化斗争的策略、文化实践的选择以及文化表达的话语方式也会很不一致。这就需要在借助文化推进社会权力变革的实践活动中,科学地认识文化的差异性、文化实践的选择性以及文化的话语特性,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从而凝聚起争夺文化权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理解文化权力争夺的基础上,主张科学认识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的社会差别,探寻作为文化斗争主体的不同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社会特性,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斗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按照《文化与权力》的作者吉布森的看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性别差别和种族差异,然后是一连串的其他因素。<sup>②</sup>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差异性包括了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性取向问题、国籍问题、语言群问题、年龄问题、身材问题、伤残问题等。显然,这是一种在文化研究中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差异性的具象化分类,在差异性的分析中推进整体文化批判和文化权力争夺的进程,对于唤起革命斗志、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凝聚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破除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借助差异性分析争取文化平等权利的方式,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张的微观革命的重要形式,其中尤其在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和通俗文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有影响的成就。其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女权主义运动。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思考女性问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澳]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②[澳]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4页。

题,破除女性生存困境,是摆脱资本主义异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恢复人的权利平等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活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第二波女权运动,通过长时间对女性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家庭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劳动性别分化的关系的详细考察,试图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对女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找到一条可以使女性摆脱困境的路径,同时也借此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霸权。种族差异研究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不平等的考查和后殖民文化所体现的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为民族解放和人类平等探寻正确的道路。通俗文化则被看作是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而兴起的文化,“实际上是大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文化,是民间文化的通称。它由大众创作,体现大众的文化实践,根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化。受葛兰西文化霸权观念的影响,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把通俗文化看作是受统治群体的反抗势力与统治集团的“兼并”势力之间斗争的场所,它以“反抗”与“兼并”为标志。霍尔甚至把通俗文化理论看作是“关于‘人民’的构成的理论,通过发展通俗文化,人们有可能团结起来,组成相对于权力集团的人民,开展反霸权的斗争。”<sup>①</sup>无论女权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被看成是工人阶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内部象征性抗议和破除霸权的基本力量,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形式。

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斗争实践方式的选择性,既反对流于解构逻辑的一般性社会批判,也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的经验主义,而是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总体性的认识和实践,探寻既有经验基础又有思想观念导引的多重性的文化斗争,针对不同文化问题采取不同权力争夺方式的文化实践观。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把文化研究引向政治追求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争夺,既不能没有科学理论,更不能没有社会实践;既要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作出科学的否定性的批判,更要积极开展理论建设和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和革命斗争;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更需要密切联系历史和现实,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方法。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他们的文化研究相较于欧洲大陆的文化批判和美国的美国文化研究滞后了30年,这就为他们在文化领域批判资本主义和追求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知识和经验。正如霍尔在他的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制者的回归》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和斗争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做法可供选择:一种是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福学派,这是一种“欧洲”观点,在“历史上、哲学上都有很大影响,理论性很强,提出了一整套内容丰富但是高度概括化的假说”;另一种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观点”,具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性。<sup>②</sup>霍尔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分析是一种解构的工作,缺乏实际斗争的策略。而“美国观点”则强调了多元文化权力论,以个人心理为基础,将自己引入狭隘的唯科学主义,其主要的关注点是个人,通过理想的实验模式谋划出一系列的预言和期望,加上严酷无情的行为主义激情,便得出了一个轻率的理论大杂烩,这个理论大杂烩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纯科学”的东西。<sup>③</sup>那么,文化研究领域理论认识和实践方式的最终选择应该是什么呢?由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更看重把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现实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能动性和总体性的历史意识,因此,在他们看来,英国的文化权力争夺的理论和实践,既不能走欧洲大陆的一般哲学分析的路子,也不能走美国式的唯科学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路子,而是必须采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式和社会运动的实践方式,强化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总体性的认识和实践,走出一条具有英国风格的道路。

①[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②Hall Stuart,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studie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London: Methuen, 1982, p. 58.

③Hall Stuart,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studie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London: Methuen, 1982, p. 59.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权力斗争的理论探索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争夺话语领导权的重要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化斗争归结为掌握反霸权话语和消除霸权话语的文化革命。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为生产关系,同时也是政治的和法律的关系。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在社会中不仅是主导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主导的思想力量。统治阶级具有话语领导权表明文化是政治的,同时表明文化也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具有命名和表现世界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构成世界并引导行动,它是意义和文化的核心,因此,如何塑造新语言,从而改变话语的能指和所指,影响大众行为和社会实践,就构成了文化权力斗争的焦点。正是围绕话语领导权这一焦点,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意义的文化解释方式、话语生产方式和文化斗争的对话方式,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实践的英国风格。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意义的文化解释以对文化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解释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作为话语意义的评价依据。文化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的不同的话语意义作为分析的对象,由此判断在不同话语及其体系中所包含的生活态度、价值诉求和隐喻指令。从“种族历史特征”分析和理解阶级意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围绕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年龄等方面组成的话语表达,开展一系列体现集体意识的社会斗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整体上重新理解和描述社会,改造社会。正如威廉斯所说,当下聚焦于“文化”一词含义的所有问题,的确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等词义变迁所代表的巨大历史变革所引发的,而“艺术”词义的变迁则展示了对这些变革的密切反应。“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因此,“文化”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sup>①</sup>

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话语生产的方式体现为通过话语的丰富和创新推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借助新的表达工人阶级文化的话语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文化马克思主义赞同福柯的看法,认为话语不仅能够调控在确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什么可以说,而且还能够调控谁可以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主导性话语总是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形成话语霸权,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达到社会监控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作为被控制的对象,完全没有话语主导权,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说自己的话,使自己从“顺从”的社会主体转变为自己作为主体,基于自己的话语立场,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场所,重复自己的主体意识,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和话语构形方式,通过工人阶级群体的话语活动模式,生产自己的文化,表达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目标,促使优势社会群体力量的形成,达到破除文化霸权的目标。在这种通过文化生产促使优势社会群体力量形成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话语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正如威廉斯所说,只有在我们渴望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才有可能唤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sup>②</sup>。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和文化生产思想集中于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彻底改变社会存在形式。在他们看来,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取代资本主义需要凝聚巨大的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境下,这种巨大的力量既不是源自经济,也不是源自政治,而是源自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文化实践和“科学”的文化活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乃至其霸权主义是由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制度的操控过程形成的,而资本主义统治是其先行条件。统治的过程就是霸权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多种形式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如同威廉斯所说,是一种基本的集体观念和由此产生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的表现,最终形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和政治力量。因此,必须有某种强大的对抗性力量才能抗衡资本主义的统治力并最终消灭这种力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5页。

②[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293页。

量。然而,凝聚巨大的革命力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动员全社会各个阶层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参与,而文化是唯一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因素,是唯一能够在“情感结构”深层唤起人们斗志的因素,也是能够通过现实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使社会发生改变的力量,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实践方式。抵抗“霸权”和“统治”是一个必须作出的选择,多样性的文化实践是最基本的途径。

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形成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强大社会力量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涵的。在他们看来,有两种不同方式使文化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其一是通过社会组织的普通模式来实现,即在“生活的整个过程”中逐步达到;其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实现,即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要求所有的文化实践活动都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文化本身也是这种“真实关系”的一部分)相关联<sup>①</sup>,通过把作为符号的文化物质化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力”和“斗争”等概念得以转到文化领域,从而使文化实践活动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与政治斗争统一起来,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现实的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分展示出来。对于这里所说的使文化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模式,文化唯物主义都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不同,根本上都是提升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实践之间结合的意义。正如霍尔所说,所谓意义,一旦深思起来,必定是一种结果,它不是语言对世界功能复制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是一种争夺话语领导权的斗争,围绕这种话语领导权,必然会有某种社会观点占据上风并赢得信任。这就重新提出了“不同社会利益”的概念以及“斗争场所”的符号概念,使它们成为语言和重大研究工作的考虑对象。<sup>②</sup>可以肯定,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实践的结合,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中“占据上风并赢得信任”,使工人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性的话语。

#### 四、结语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历史和现实结合的产物,是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催生和发展的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形式和实践方式,在与“天使的较量”过程中,把“红细胞”注入问题研究,彰显出独特的英国特性和思想意识,使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现实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体现“英国特性”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导向的文化价值观,推进了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大众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文化创作和生产中的作用,推进和发挥大众文化的“社会民主”的政治意识,抵抗资产阶级的“霸权”和“统治”,形成了被称作具有“英国风格”的文化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历史意识。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争夺文化领导权乃至社会领导权作为文化理论研究和文化实践活动的根本目标,使马克思主义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活动中赢得人们的信任,形成具有“英国品质”的文化实践观。总体来看,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文化治国理论,对于推进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不失为它山之石。

(责任编辑:周文升)

<sup>①</sup>Hall, Stuart,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in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ed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p. 322.

<sup>②</sup>Hall, Stuart,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studie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London: Methuen, 1982, pp. 77-78.